

# 以車抗騎

## ——宋代的戰車論述與實務

方震華 \*

北宋軍隊在面對北部、西部的外敵時，經常受制於對手強大的騎兵，於是尋找剋制騎兵的方法，成為統治階層構思軍事策略時重要的課題。在此需求之下，前代文獻所載使用戰車的前例或理念，引發宋代讀書人高度的興趣；持續有人倡議大量製造和使用戰車，以求在平原曠野對抗騎兵。但是，在現實的作戰中，戰車消失已久。若要實行車戰，車輛的形制與作戰的方式皆需設計規畫，將校、士兵也要重新整訓，以熟悉戰車的操作。相關事項十分複雜，導致車戰理念的可行性備受質疑。由此可知，宋代君臣討論戰車的使用，是企圖落實書本所載的理念，但兵學知識與現實作戰之間的落差，卻造成車戰執行上的困難。北宋末年在面對女真人強大的騎兵時，宋軍將領製造戰車對抗，皆無成效，但南宋官員仍持續倡議使用戰車。這反映宋軍長期受制於敵方騎兵，文獻所載以戰車對抗騎兵的歷史事例，始終成為部分官員嘗試仿效的典範。

關鍵詞：戰車、騎兵、兵學、宋代、歷史知識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北宋軍隊在面對北部、西部的外敵時，經常受制於對手強大的騎兵，必須尋找剋制的方法。在此需求下，文獻所載使用戰車的前例或理念，引發宋代讀書人高度的興趣；持續有人倡議大量製造和使用戰車，以便在平原曠野對抗騎兵。但是，在現實的作戰中，車戰早已消失，軍隊雖仍然配置和使用車輛，但主要用於運輸後勤物資，而非在野戰中用作戰鬥工具。由於理念與現實間存在落差，「以車抗騎」的主張想要落實於戰鬥之中，殊非易事。尤其是文獻所記錄的前代車戰事例，內容多半簡略且缺乏系統，對於戰車的大小、形式、配備與操作方式，提供的線索都相當有限。因此，宋代倡議車戰者儘管能從多種古籍中習得車戰的理念，但要真正施行於戰場，從戰車的形制，到因應不同地形、敵情的戰鬥方式，都必須自行設計規畫。至於這些全新發展出來的戰車與作戰構想是否便於使用，更有待實戰的驗證。在累積足夠的成功案例之前，倡議車戰不免引發可行性的質疑。由此可知，透過閱讀前代史籍，宋代的讀書人不難獲取與「車戰」相關的「歷史知識」。但是，由於作戰形態早經變化，企圖將此種「知識」應用於戰場，並不能單純地復行「古法」，而必須根據宋代的實際狀況，做出前所未有的規畫。這就導致車戰的構想言人人殊，眾多的爭議由此而展開。如果只以「食古不化」來看待宋人對車戰的重視，則不免忽略其間的複雜樣貌。

現代學者雖然注意到宋代關於車戰的論述，但並未有深入的討論，而傾向將此種現象，視為北宋君臣不重視騎兵建設的一個例證。<sup>1</sup>這可

---

<sup>1</sup> 參見何兆泉，〈宋代「以車制騎」問題初探〉，《軍事歷史研究》，2008：4（北京，2008），頁115-121。

能是因為宋代關於戰車的論述雖然數量眾多，真正施行的例證卻十分有限，對於宋軍的作戰未能產生重大影響，因而難以吸引史家的注意。但是，跳脫實際作戰的層面，宋代車戰論述是值得分析的文化現象。在現實中早已不復存在的「車戰」，之所以得到宋代政治人物空前的關注，顯然是與他們閱讀書籍的內容有關。換句話說，倡議車戰是宋代讀書人企圖將書本所載的知識，落實於當時的戰爭之中。研究此一課題，可以分析宋代士人如何看待歷史前例與實務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而思考「文士論兵」的特色。相關論述的內涵不僅反映宋軍在實際作戰中所面臨的困境，也顯示他們如何看待「古」與「今」之間的關係。

本文將從討論宋人經常援引的車戰前例入手，呈現倡議戰車者的核心關懷，藉以說明宋人提出的車戰構想所反映出的現實需求。接著對宋人提出的具體車戰構想進行分析，說明其規畫的重點與所引發爭議之處，最後討論車戰構想難以落實，但一直受到關注的原因。

## 二、歷史的前例

關於中國古代的車戰，最常被提及的事例是在春秋時代，交戰雙方駕駛戰車，使用弓箭、戈矛相互攻擊、追逐，這些史事在《左傳》等文獻中多有記載。<sup>2</sup>到了戰國時代，步兵與騎兵逐漸成為戰場的主力，傳統的車戰消失。<sup>3</sup>直到唐末五代的戰亂中，精於騎射的部隊仍

---

<sup>2</sup> 春秋時代著名的戰役如：齊魯長勺之戰、晉楚城濮之戰，皆可見雙方以戰車交鋒、追逐的記錄，參見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收入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影印），卷8，〈莊公十年〉，頁146-147；卷16，〈僖公二十八年〉，頁272-273。

<sup>3</sup> 關於周代的車戰以及戰車逐漸消失的歷史過程，參見楊泓，〈戰車與車

被視為戰場上的主宰力量。例如：後梁貞明元年(915)，後梁主帥劉鄩(?-920)統軍與沙陀首領李存勖(885-926)的部隊對峙於河北地區，在給後梁末帝(888-923，913-923在位)的奏書中，劉鄩描述自己所面對的強敵：

纔及宗城，周陽五奄至，騎軍馳突，變化如神。臣遂領大軍，保於莘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偵視營壘，兵數極多；樓煩之人，皆能騎射，最為勍敵，未可輕謀。<sup>4</sup>

可見周德威(?-918)手下由游牧民族組成的大量騎兵，具有高度的機動性，其作戰方式多變難測，成為後梁軍最難應付的威脅。

騎兵的優勢不僅展現於地勢平坦的華北地區，在江、淮流域的作戰中同樣具有主導性。唐昭宗乾寧二年(895)，沙陀領袖李克用(856-908)派遣精於騎射的史儼(?-916)、李承嗣(866-920)率領數千騎兵支援山東的朱瑾(867-918)作戰：

史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為帳中親將，驍果絕眾，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兗、鄆。……及朱瑾失守，與李承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軍，不閑騎射，既得儼等，軍聲大振。尋挫汴軍於清口。其後併鍾傳，擒杜洪，削錢鏐，成行密之霸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sup>5</sup>

等到朱瑾為朱溫(852-912)所敗，史儼等人被迫南逃加入楊行密(852-905)的陣營，使其戰力大增，乃得以阻止朱溫部隊的南下，進而兼併鄰近

---

戰——中國古代軍事裝備札記之一》，《文物》1977：5(北京，1977)，頁 82-90；楊泓，〈戰車與車戰二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3(北京，2000)，頁 36-52；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形成》(台北，聯經出版社，1990)，頁 83-86。

<sup>4</sup> 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23，〈劉鄩傳〉，頁 311。

<sup>5</sup> 《舊五代史》，卷 55，〈史儼傳〉，頁 744。

的幾個軍閥勢力，使楊行密成為長江以南軍力最強大的政權，騎兵在長江流域作戰同樣被認為具有決定性的優勢。

正因如此，較少戰馬的一方，在作戰時必須尋求剋制騎兵之法。後梁貞明三年(918)，契丹大舉進攻沙陀政權據守的幽州，李存勖派李存審(862-924)等將領救援。李存審在討論作戰策略時說：「虜眾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sup>6</sup>可見，步兵若在地勢平坦的地區遭受騎兵的衝鋒襲擊，容易造成隊伍的混亂和潰敗。李存審因應的作法是：「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sup>7</sup>聚集木製的「鹿角」而形成臨時性的寨，步兵在此種工事的掩護下以弓弩對抗騎兵。顯然，步兵在野戰時需要某種防禦工事來對抗騎兵的衝鋒襲擊，但現存五代的作戰紀錄中，並未見到使用戰車來對抗騎兵的事例，也未見有相關的議論。

到了北宋時期，史書中記載漢代以降一些將領在作戰時使用車輛的事蹟，開始受到讀書人的注意。宋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在對西夏作戰期間，下令文臣曾公亮(999-1078)、丁度(990-1053)等人編修《武經總要》，彙整古今作戰之法以及軍事相關的知識。《武經總要》中有一節討論「用車」之法，提到：「車戰，三代用之，秦漢以下，浸以騎兵為便，故車制湮滅，世莫得其詳。」<sup>8</sup>可見，編者已認知到車戰自秦漢以來消失已久，其具體作法已難考究。不過，下文又指出自

6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卷270，後梁貞明三年，頁8817。

7 《資治通鑑》，卷270，後梁貞明三年，頁8818。

8 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中國兵書集成影印明萬曆金陵書林唐富春刻本)，前集卷4，〈用車〉，頁1-3。後文引用《武經總要》對於車戰的討論皆出於相同文獻，不再一一註明出處。

漢代以降有幾個使用車輛作戰的例子或議論，可供參考：

至漢衛青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為營，縱騎兵出擊，單于於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猝與虜遇，衆寡不敵，陵以大車為營，引士卒於外，千弩俱發，虜乃解去。晉馬隆討樹機能，賊乘險設伏，遏截絕隆前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以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遂平羌衆。唐馬燧亦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隘以遏奔衝。宋咸平中，吳淑上議，復謂平原廣野，胡騎焱至，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用車戰為便。

上述所列衛青(?-106 B.C.E)、李陵(?-74 B.C.E)等四項前例皆是以車輛作為防禦之用，特別是在軍隊停止行進時，將車輛相連作為營寨，以阻止敵軍的衝鋒襲擊。北宋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時期吳淑(947-1002)上書，主張在平原地區必須藉由車輛相連，抵抗突然來襲的騎兵，也是企圖使用相同的作法。根據這些前例，《武經總要》的編者總結說：「此數者皆謂以車為衛，則非三代馳車擊戰之法，然自足以禦敵制勝也。」由此看來，仁宗朝官員想參考仿效的「車戰」，並非春秋時代以戰車相互追擊、交鋒的作戰方式，而是漢代以後將車輛相連為營的防禦之法。依此理念，車輛在戰場上的使用，可以概分為「三代」與「秦漢以下」兩個階段，各自有截然不同的功能與作法。

不過，秦漢以下使用車輛作戰，也存在失敗的前例，《武經總要》接著提到：「惟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夾以馬步，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琯遂遁走，此亦古今殊時，而用有利害也。」引用《舊唐書》的記載，認為房琯(696-763)是仿效「春秋車戰之法」，以兩千輛戰車為主力，對

安祿山(703-757)的部隊發動攻擊，但慘遭挫敗。<sup>9</sup>《武經總要》的編者以「古今殊時」來解釋房琯的失敗，似乎暗示房琯不了解古今時空的差異，企圖使用「三代馳車擊戰之法」，才會造成挫敗。由此看來，《武經總要》之所以提及房琯失敗的前例，是為了說明在秦漢以降，以步騎為主的作戰中，利用戰車進行攻擊的實屬不當，「以車為衛」才是適當的方式。但是，在《武經總要》後續的行文中，又闡述車戰的功能：「則知車戰之法，所以躡躒強陣，止禦奔衝。行則負載糧械，止則環作營衛，其用一也，其制則不必盡同。」宣稱戰車扮演多重的角色，既可以衝鋒陷陣，擊破堅強的敵陣；在停止前進時，又可用以抵禦敵軍的攻擊。此外，軍隊行動時，車輛可用以載運人員、器械和糧食；大軍休息時，車輛相互連接，則成為臨時性的營壘。問題是，所謂「躡躒強陣」，顯然是戰車在「馳車擊戰」時代才可能發揮的功能，在前文提及衛青等人的事例中，並沒有出現以車輛「躡躒強陣」的戰法。如此一來，《武經總要》的編者仍是將「馳車擊戰」與「以車為衛」放在一起討論，共同形成他們所認知的戰車功能。這不免令人疑惑，在步、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利用戰車進行衝鋒攻擊，企圖突破對方的「強陣」是否合宜？

事實上，《武經總要》接下來的內容可能更令讀者感到困惑。編者從《六韜》中抄錄車戰的相關條目，宣稱：「其用車之要，古兵法皆具之。」儼然主張只要熟讀古代流傳下來的兵書，即能掌握車戰使用的要訣。在《六韜》中以周武王與太公對話方式所呈現的「用車之要」，皆是將戰車定位為作戰時攻擊的主力。像是：「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sup>10</sup>宣稱戰車可以突破對方主

<sup>9</sup>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11，〈房琯傳〉，頁 3321。

<sup>10</sup> 呂望著，《六韜》(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中國兵書集成影印中華學藝術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犬韜〈均兵第五十五〉，頁 502。

力佈成的兵陣，並用以阻斷敵軍的撤退。另一段文字又說：「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sup>11</sup>先宣稱在分別對抗步兵與騎兵的情況下，一輛戰車可對抗八十名步兵或十名騎兵；後文又將可對抗的步兵與騎兵的數量相加，主張十輛戰車即可擊敗一千名敵軍。這顯然是在強調車兵比騎兵、步兵更具有攻擊力，是陷陣破敵的主要戰力。但是，歷史記載中並無車兵、步兵、騎兵在戰場上相互交鋒的實際案例可供參考，《六韜》對戰車攻擊能力的描述既難以驗證，也與前述衛青、李陵等人「以車為衛」的史實毫不相干。由此看來，《武經總要》在論述歷史上使用戰車的各種前例之後，抄錄《六韜》中部分文字，用以說明「用車之要」，顯得十分突兀。也許是意識到此種矛盾，編撰者又在《六韜》引文之後，論述北宋的狀況作出總結：

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前賢著說，皆可推用，故謂：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機，此用車之利。

這是將對車戰的討論重新拉回到衛青等人的前例，將戰車定位為防禦之用，攻擊行動則交由伴隨的騎兵來執行。由此可見，《武經總要》抄錄前代兵書與歷史案例來陳述戰車功能，雖然強調「古今殊時」造成的差異，但前後論述內容存有明顯的矛盾，看來編者並無法清楚辨析戰車究竟應扮演攻擊或是防禦的角色。

<sup>11</sup> 《六韜》，大韜〈均兵第五十五〉，頁 502-503。此段文字在《武經總要》卷四〈用車〉作：「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與《六韜》原文有些微出入。



《武經總要》是現存宋代文獻中最早詳細討論「用車之法」者，其內容反映出北宋文人根據史書與兵書的內容來理解戰爭，認為這兩類文獻皆可作為用兵作戰時的參考，但未能清楚認知車戰相關記載中因時空差異所造成的分歧。此種軍事知識上的侷限，使得北宋君臣在提出「以車抗騎」的規畫時，出現許多窒礙難行的問題。

### 三、北宋前期的車戰構想

依《武經總要》所記載的內容，宋代最早出現的車戰構想，應為據稱由宋太宗(939-997，976-997 在位)「御製」的「平戎萬全陣」。《武經總要》稱此一陣法的製作背景是：「伏詳聖制，特以河朔之壤，遠近如砥，胡虜恃馬，常為奔衝。故因洞當餘法，廣增其制，所以挫馳突之銳，明堅重之威，循名摘實，知神謀之有在矣。」<sup>12</sup>可見太宗是因為河北地區地勢平坦，非常適合騎兵發動攻擊，為了對抗騎兵而有此一陣法。所謂「洞當」是古代兵陣的名稱，在太宗時代編成的《太平御覽》中曾記載：「兵鈴曰：有運衡陣、洞當陣、龍騰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sup>13</sup>文中的「兵鈴」很可能是指宋代以前編成的某部兵書，但由於《太平御覽》只提及洞當等陣的名稱，並未說明這些陣法的實際內容，「洞當餘法」所指為何？已不得而知。

「平戎萬全陣」的中心為三個由戰車相聯而成的方陣(參見附圖 1)。每一方陣使用 1,440 輛戰車，每車配置士兵二十四人，其中三人在車上，車下的十九人中有四人掌管拒馬。這代表陣法布成之後，車輛與拒馬共同形成阻絕工事，以致每個方陣必須開設四個門作為人馬

<sup>12</sup> 《武經總要》，前集卷 7，〈大宋戎萬全陣法〉，頁 7。

<sup>13</sup> 李昉編纂，夏竦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點校二版)，卷 301，〈兵部·陣〉，頁 715。

進出的通道。在每個方陣中建有八個望樓，作為瞭望之用。在三個車陣的週邊則布置騎兵，分成前鋒、後殿、右翼各一以及二個左翼，整個陣法預計使用 140,930 名士兵。

車陣與望樓猶如在曠野中臨時搭建的城寨，有利於掌握戰場情勢的變化，阻擋敵軍的攻擊，但此一陣地在構成後便難以移動。在《武經總要》所附的文字說明中，也未提及車陣與望樓要如何移動，以因應敵情。在此情況下，一旦敵軍放棄攻擊宋軍布置的陣地，改向其他地區前進，隱蔽於車輛與拒馬之後的宋軍即陷入兩難。步兵一旦離開方陣追擊敵軍，就不再有車輛的屏障；不主動出擊，則無法殲敵取勝。由此看來，如果宋軍想要避免被契丹騎兵突然發動的衝鋒擊潰，與其在平原曠野布置此種大陣，還不如據守於既有的城池之中，這其實是多數宋軍將領對遼軍作戰時採取的作法。<sup>14</sup>

在太宗與真宗時期，契丹騎兵是宋政權在國防上難以解決的威脅。針對這一點，吳淑在咸平四年(1001)上書真宗倡議車戰，其構想與「平戎萬全陣」頗為接近，大批車輛由牛隻牽引至戰場，布置成方陣：

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必須平遠廣野，雲布霧散，馳逐往來。士卒前無所依，後無所據，故戎騎雷動颺至，易致退縮，苟非聯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銜扼，駕以牛，布為方陣，四面皆然，東西鱗次，前後櫛比。……

<sup>14</sup> 據說宋太宗曾將「平戎萬全陣」繪製成圖，於雍熙四年(987)親自授予潘美(925-991)、田重進(929-997)等邊將，但未見此陣法用於實戰的例證，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28，「雍熙四年五月庚寅」條，頁 638；陳均編，許沛藻等點校，《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4，頁 78。真宗時代，北宋雖在河北佈防重兵，但在遼軍大舉進犯時，宋軍將領多半據守城池，不敢出城進行正面的交鋒。參見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23(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 75-84。

賊至，令兵士上車，每車載四人，皆持弩，車之內數十步間，連六車或四車，上為重樓，施強弩。賊至，擊鼓為節以射之，敵不能犯，必當散去，乃出騎兵擊之，此中國制敵之要術也。<sup>15</sup>

吳淑認為宋軍在平原地區作戰時，如果缺少可以防禦的工事，士兵很容易受騎兵的衝鋒襲擊而後撤。他規畫的車戰之法是以牛隻牽引平時使用的車輛，遇敵之後，車輛相連作為防衛，步兵皆上車作戰，以強弩對抗敵軍的衝鋒。等到敵軍因進攻失敗而後撤，再出動騎兵加以攻擊。可見，車輛相連只為防禦騎兵的攻勢，即使宋軍能藉此而不被敵騎擊潰，但想在戰場上真正擊敗敵軍，仍須靠騎兵發動攻勢。因此，騎兵是否能野戰中擊退敵軍，恐怕才是勝負的關鍵，但吳淑對騎兵的作戰毫無討論，他關注的重心顯然在於防禦而非攻擊。在後續的論述中，吳淑強調北部邊的重點區域在「獨界河以西，狼山以東，不過百餘里，最為要害，戎人所入，常在此矣。」因此，吳淑計畫以車來防守此一缺少山河阻礙的地區：「度百車可占一里，以萬車相次，則百里之地，結而無隙矣。」認為連結一萬輛兵車，可以構成防線，阻擋遼軍的南下。問題是，車輛無法形成永久性防線，除非宋軍能預先掌握對方出兵的時間與攻擊方向，否則在遭遇敵軍時才將戰車相連，恐怕緩不濟急。自太宗朝多次對遼作戰失敗，真宗時期的宋軍只能被動防禦遼兵的入侵。<sup>16</sup>吳淑構想的車戰是一種以防禦為主的作戰思維，將戰車當成移動性或是臨時性的「長城」。但是，只考量防禦而沒有規畫攻擊，在作戰中其實難以取勝，吳淑似乎忽略了這一點。

綜而言之，宋仁宗朝之前的車戰論述，基本構想是「以車為衛」，因應河北平坦的地形與契丹強大的騎兵，寄望以戰車相連構成方陣，提

1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50，「咸平四年十一月辛巳」條，頁 1087。

16 參見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頁 75-84。

供步兵屏障。但在整體規畫上仍過於簡單，不易執行。不過，車戰是當時流行的理念，甚至出現在北宋中期武舉殿試的試題中：「前代車戰，其來尚矣！後世以武剛而自衛，以偏箱而致討；或行則載于戈甲，止則為于營陣。宜條利害，若為設施，悉心以陳，朕將親覽。」<sup>17</sup>可見，前述《武經總要》所載的武剛車、偏箱車，是主政者認為有志於武舉者必須熟知的理念，並可據以提出實際車戰的規畫。在仁宗朝之後，倡議車戰者試著提出更為詳細的計畫，而首先要面對的課題是：什麼樣的車輛適合在戰場上使用？為數眾多的車輛又要如何取得？

#### 四、戰車的形制

在戰場上所使用車輛的形制、大小和重量，與車輛被賦予的功能密切相關。周代的戰車是作為攻擊之用，車輛的構造必須輕便簡單，才能在馬匹的牽引下具有快速移動的能力。因此，「輕車，古之戰車也。」的說法在《後漢書》、《晉書》、《宋書》、《通典》等文獻中皆有記載，宋代的讀書人只要對前代史籍有所涉獵，不難獲得此一理念。<sup>18</sup>在傳統的車戰消失後，軍隊中的車輛主要用以運輸人員、物

<sup>17</sup> 胡宿，《文恭集》（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第116冊，臺北：藝文出版社，1969，據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影印），卷29，〈御試武舉策題〉，頁3。胡宿擬定武舉試題的時間不詳，應是他在仁宗、英宗在朝廷任職時所為。胡宿的生平，參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35，〈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頁514-520；脫脫等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318，〈胡宿傳〉，頁10366-10372。

<sup>18</sup> 參見范曄撰，司馬彪補志，《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29，〈輿服上〉，頁3650；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5，〈輿服志〉，頁755；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18，〈禮五〉，頁500-501；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資，其體積變得較為龐大，以提供容納人員或物資的空間。前述《武經總要》提及以車「禦敵制勝」的案例中，像是李陵在面對匈奴的包圍時，「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或是馬隆與羌人作戰時「為木屋施於車上」，顯然都是使用體積龐大的車輛，才適當成防禦工具來使用。<sup>19</sup>在北宋前期也有將領利用車輛執行類似的防禦性目的，景德元年(1004)，真宗親征至澶州時，駕前排陣使李繼隆(950-1005)因擔憂澶州城的防禦設施不足，將數千輛「大車」拆去車輪，重疊環繞城濠作為防禦。<sup>20</sup>此種「毀車為營」的作法完全不用考慮車輛的機動性，只求將之固定成為工事，則車輛的體積愈大，自然愈符合此種需求。不過，李繼隆是將車輛用於防衛城池，並非在野戰使用，這與吳淑等人的構想顯有不同。

由於車輛的體積大小與其能發揮的功能關係密切，倡議者若對此缺乏理解，所提車戰的規畫往往滯礙難行。熙寧六年(1073)，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因憂慮遼軍可能即將南侵，下令軍器監準備製造戰車的車材，並且下令徵調民間的車輛作為戰備，引發百姓的騷動和官員的抗議，神宗與沈括(1031-1095)論及此事：

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沈]括曰：「未知。車將何用？」  
上曰：「北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鎗車，重大椎樸，以牛

卷 64，〈禮·嘉禮九〉，頁 1798。

<sup>19</sup> 參見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24，〈李陵傳〉，頁 2452；《晉書》，卷 57，〈馬隆傳〉，頁 1555。

<sup>20</sup> 《武經總要》，後集卷 14，〈用車〉，頁 18。《宋史·李繼隆傳》亦記此事，但較為簡略，參見，《宋史》卷 257〈李繼隆傳〉，頁 8968。

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上益喜曰：「無人如此作口者，朕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上甚多太平車之說也。」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為非。」<sup>21</sup>

沈括針對古代「戰車」與民間現有運輸用車的不同，論證徵調民間車輛來對抗騎兵的不當。他根據《周禮》所記，以教授「國子」六藝之一的「五御」，來說明古代戰車的特性。根據漢代鄭玄(127-200)的註解，「五御」是指五種駕車的技術：「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顯示周代戰車的操作者必須有能力高速行駛，以追逐禽鳥、通過複雜的地形或障礙物。<sup>22</sup>沈括據此推斷，古代所用兵車不可能是笨重的大型車輛，而具有輕巧快速的特性，這與宋代百姓用以載貨，以牛力牽引的「太平車」有根本上的差異。<sup>23</sup>因此，徵調民車並不適合作為軍事使用。

沈括雖然精確地指出「太平車」因體積龐大，在戰場上移動不便的缺點，但他以周代的「五御」來回應神宗對於「以車抗騎」的構想，其實是混淆了周代「車戰」與後世使用車輛作戰的不同。自漢代以降，軍隊在作戰中「以車為衛」，都是使用「大車」作為防禦工事，而不是像周代軍隊那樣，駕駛輕快的戰車，在平原曠野中與騎

<sup>21</sup> 邵博著，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22，頁 169。沈括論徵用民車事，亦可參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5，「熙寧七年七月丙戌」條，頁 6240。

<sup>22</sup>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收入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影印)，卷 14，〈地官司徒·保氏〉，頁 212-213。

<sup>23</sup> 關於北宋「太平車」的形制，參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卷 3，〈般載雜賣〉，頁 116。

兵相互追擊。神宗為沈括的言論所說服，顯示他雖然認定只有戰車可以在野戰中對抗騎兵，卻不清楚周代「馳車擊戰」與後世「以車為衛」之間的差異。由此看來，宋神宗與沈括其實都對「以車抗騎」的具體內涵不甚了了。不過，二人之間的對話顯示，當時的民間車輛並不適用於戰場，前述吳淑主張「取常用車」布成方陣的意見缺乏可行性，若要實行「以車抗騎」，勢必需要設計新的車輛。

在北宋前期提倡使用戰車的議論中，多半沒有針對車輛的形制提出詳細說明。較早提出具體規畫的是仁宗至和二年(1055)郭固進呈的〈車陣法〉，對戰車的形式與作戰方式有詳細的描述：

初，知并州韓琦言：「[郭]固嘗造車陳法。今以固所說，就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陳遇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以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以刺戟於後，行載兵甲，止為營陳者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前後二戶，高與箱等，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輓輪籠轂』是也。箱置牀子弩一，車上容五人，弓二弩二，其一人擊金鼓，以為一車進止。前轅置蒙□一，以障牽車者，古所謂陷車也。其車周回悉覆以氈，以備矢石火箭也。凡一車二十五人，車上五人，前挽後推十四人，執器械六人。凡車十乘，均以步騎多少隨之。三軍所止，橫列直布，以為寨腳。夜則聯制鐵索，以撼陷地，制其兩輪。兩車之間，用人五十，其車相去不過五尺。行止挾轅以為駐隊，所謂伍承彌縫也。唐李靖嘗引漢、魏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帥，率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以今法準之，則跳盪為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琦以為可用於平川之地，一則臨陳以抑奔

衝，二則下營以為寨腳。今令固自齎車式，詣闕進呈。」<sup>24</sup>

郭固的車兵是搭配步、騎兵進行作戰，一車配置二十五人。車輛的部分是將民車的外型改為前尖後方，再將車箱增高、加大，以容納人員、武器和金鼓；全車還要蒙上氈毯和皮革，以防衛矢石及火攻。如此一來，車輛變得龐大沈重，需以十四人前拉後推，才能移動，若再加上一名敲擊金鼓以指揮士兵行動者，則每車計畫配置的二十五人中只有十名武裝戰鬥人員。即便不考慮戰車移動緩慢的問題，一旦發生戰鬥，為數眾多的推車人員不僅難以在戰場上存活，也勢將拖累作戰士兵的行動。郭固的規畫未被落實，實不令人意外。

等到熙寧年間(1068-1077)宋遼之間因疆界問題產生一連串爭議，神宗計畫以戰車防禦契丹的南侵，乃於熙寧六年十二月下令軍器監製造戰車。次年(1074)二月又下令：「仍以牛皮及蘊木製車上蔽陳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sup>25</sup>後來神宗因沈括的反對，停止徵用民車，轉而要求到軍器監儘速進呈「可用戰車制度」。<sup>26</sup>由此可見，徵用現有車輛既不可行，要執行車戰，就要制訂出合於實用的戰車規格。只是設計出堪用的戰車絕非易事，這使得神宗對於車戰的重視始終停留在規畫的階段。<sup>27</sup>在熙寧八年(1075)宋與遼達成畫界的協議後，神宗開始專注於對西夏用兵。<sup>28</sup>由於宋夏邊境的地形複雜，不適合車輛的行動，

2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8，「至和二年二月壬辰」條，頁 4306；參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國立北平圖書館印行本影印），〈兵二六之二四·陷陣車〉。

2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48，「熙寧六年十二月丁亥」條，頁 6061；卷 250，「熙寧七年二月庚辰」條，頁 6093。

26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8，「熙寧七年十一月乙未朔」條，頁 6286。

27 熙寧七年三月，神宗對執政官員抱怨：「如造車，車未成而騰說已紛紛。」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58，「熙寧七年三月壬寅」條，頁 6110。

28 神宗時期宋與遼的疆界爭議過程，參見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



神宗不再要求臣僚製造戰車。在元豐四年(1081)與五年(1082)兩次對西夏的戰鬥中，宋軍皆以步騎兵為主，騎兵的角色尤其重要。元豐六年(1083)，長期在陝西統兵的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劉昌祚(約 1022-1089)上奏神宗，說明取得戰馬的迫切性：

軍事之先，莫如馬政。人雖千百，可招呼而集；馬雖十數，寧可容易而得？須是素養有備，乃可應敵。加以鄜延比之諸路，非產馬之地，難以蓄牧。永樂一日失六千匹，不知平時力用幾日，費用幾何，能集是數？以累不貲之財力，失於頃刻之間，寧不惜哉！俗謂「人強馬壯」，若能如此，可謂兩全，倘若強弱不齊，適足為累。故馳逐、應急、取勝，非馬不能。<sup>29</sup>

劉昌祚對於宋軍在元豐五年永樂城之役挫敗，造成鄜延路戰馬慘重損失，深感惋惜。他強調騎兵是戰場上的主宰力量，「馳逐、應急、取勝」都要倚重騎兵，但戰馬卻不易取得，必須要長期的培育。由此可見，前線將領真正看重的還是騎兵。

不過，隨著哲宗(1077-1100，1085-1100在位)、徽宗(1082-1135，1100-1126在位)持續對西夏用兵，雙方互有勝負，宋軍始終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將戰車使用於西部戰場的提議開始出現。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邢恕採納鄉人許彥圭的戰車設計，建議徽宗在河北和陝西製造戰車。<sup>30</sup>徽宗於崇寧三年(1104)下令地方官依許彥圭的設計造車，卻衍生出許多弊

北：聯經出版社，1984），頁 137-153。

<sup>29</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37，「元豐六年七月壬申」條，頁 8133-8134。

「永樂一日失六千匹」，原作「永樂一日失六十四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改。參見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卷 75，〈馬政〉，頁 8。劉昌祚的生平，參見《宋史》，卷 349，〈劉昌祚傳〉，頁 11053-11055。

<sup>30</sup> 《宋史》，卷 471，〈姦臣一·邢恕傳〉，頁 13704。

端。<sup>31</sup>熙河路轉運使李復(1052-?)上奏反對此事，指出當時作戰方式已和古代完全不同：

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多在平原廣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為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sup>32</sup>

認為古代使用戰車，是因為交戰的地點多在平原，現在宋軍面對的狀況則截然不同。由於敵軍既以騎兵為主，機動性極高，宋軍必須據守險要之地，以資對抗。移動緩慢又無法行駛於複雜地形的車輛，根本難以在此種作戰型態下使用。除此之外，許彥圭設計的戰車較宋軍現有的車輛更為龐大笨重，又產生更嚴重的問題：

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今配買木植、物料，差顧工匠，大為費擾；既成，難於牽拽。昨東來者，牽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戰車棄於道路，大為諸路之患，其糜費不知其幾千萬矣！<sup>33</sup>

新造戰車的車身太過寬大，無法配合道路上既有的車轍，以致移動困難，負責運送新製戰車的士兵，即使自行購買牛隻來拖行，一日也只能前進五至七里。眼見運送任務難以達成，士兵紛紛捨棄戰車而逃亡，導致新產製的戰車無法運抵前線。由此可見，連未裝載人員、武器的

<sup>31</sup> 依許彥圭車樣製造的戰車，每乘轅長一丈九尺，輪高五尺八寸，底闊四尺二寸，遠較宋軍原本使用的車輛寬大，見《宋會要輯稿》，〈兵二六之二五·五十將兵車〉。

<sup>32</sup> 李復，《滴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乞罷造戰車〉，頁9。

<sup>33</sup> 李復，《滴水集》，卷1，〈乞罷造戰車〉，頁10。

空車都難以移動，此種過於龐大的戰車顯然無法使用，只是徒然浪費資源。

即使不考慮戰車設計上的問題，老將王恩也對徽宗指出，讓士兵使用前所未有的器具作戰，十分危險：

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王]恩，恩曰：「古有之，偏箱、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帝善其對。<sup>34</sup>

由於車戰早已消失，士兵對於使用戰車毫無概念，突然將車輛交付軍隊，反而會在戰鬥時造成混亂。對宋代讀書人而言，文獻中利用車輛作戰的各種前例，使他們熟悉車戰的理念，但要將此一理念付諸施行，卻是要軍中將士去適應一種全新的作戰工具與戰鬥型態。除非有長期而完整的訓練，否則一旦在部隊中配置戰車，只是讓宋軍自亂陣腳。由於李復與王恩皆指出許彥圭車戰構想的不合理之處，最終促使徽宗放棄造車的政策。<sup>35</sup>直到徽宗在位的晚期，陝西邊區仍以步兵與騎兵，政和三年(1113)，秦鳳路經略安撫使何常向徽宗說明對西夏作戰時宋軍具有的優勢：

自古行師用兵，或騎或步，率因地形。……我諸路並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平居以田獵騎射為能，緩急以追逐馳騁相尚。又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扞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若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扞賊，次以勁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皆穿心達臆矣。或遇賊於平原廣野之間，則馬上用弩攢射，可以一發而盡殪。兼牌

<sup>34</sup> 《宋史》，卷 350，〈王恩傳〉，頁 11089。

<sup>35</sup> 《宋史》，卷 197，〈兵志十一〉，頁 4948-4919。

子與馬上用弩，皆已試之效，不可不講。<sup>36</sup>

可見不論在山區或平原地區，宋軍皆是由步兵與騎兵協同作戰，而以弓、弩、盾牌為主要的武器。

## 五、實戰的結果

崇寧三年是北宋政府首次為了準備車戰而大規模製造戰車，結果是徒然浪費人力與資源，對實際作戰毫無助益。但是，此一失敗的案例並沒有動搖倡議車戰者的信念。等到宣和七年(1125)，金兵南下，宋軍幾乎望風潰散，部分官員又寄望以戰車對抗金朝強大的騎兵。例如：高宗(1107-1187，1127-1162 在位)建炎元年(1127)六月，宰相李綱(1083-1140)上三議，其中之一為「乞教車戰」，力主「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sup>37</sup>在整篇奏書中，李綱沒有說明他認為騎兵無法勝過戰車的依據為何，但他明確指出宋軍在戰場上的致命弱點：「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可見，自從金兵南下，宋軍普遍缺少抗敵的意志，一旦遭遇騎兵，往往快速潰散。可見騎兵的速度與衝擊力對宋軍構成強大的心理壓力，不待實際交鋒，勝負已分。李綱因而希望以戰車構成防禦工事，給予士兵安全感以防止全軍潰散。因此，促使李綱倡議車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相信戰車可以提供有效的防禦，「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

<sup>36</sup> 《宋史》，卷 354，〈何常傳〉，頁 11166。

<sup>37</sup> 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6，「建炎元年六月丙戌」條，頁 189；李綱，《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收入《閩刻珍本叢刊》，第 23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據明正德十一年[1516]胡文靜蕭汴刻本影印)，卷 24，〈乞教車戰劄子〉，頁 7。後文所引用李綱的主張出於相同史源，不再一一註明。

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可見「避免士兵逃散」是倡議使用戰車的首要考量。也就是說，車輛是一種防禦工事，使士兵使所依恃；同時也是障礙物，防堵士兵任意後撤。李綱樂觀的預期，只要戰車給予士兵堅持作戰的信心，就能夠取得「持久以取勝」的結果。

至於戰車的形制，李綱採用武官張行中的設計，他指出：「靖康間獻車制者甚眾，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可見，車戰的提議在當時頗為常見，而李綱的構思的車戰是以一車搭配步兵二十五人，其中四人負責推車，車上架弩，其餘士兵持用各種武器配合作戰。但是，李綱在奏書中沒有提及的史實是，張行中的戰車構想曾在靖康元年(1126)救援太原的作戰中付諸施行，宋軍依張行中的提議，製造了一千多輛的戰車，希望能對抗金人的鐵騎，但仍在短時間內被擊潰。<sup>38</sup>

靖康年間宋軍使用戰車的另一案例是知磁州宗澤(1059-1128)採納劉浩的提議，製造了一百五十輛戰車，於靖康二年(1127)三月從磁州進兵，企圖收復汴京。宗澤以戰車與金兵正面交鋒的結果是：

壬寅，領兵推戰車追襲，欲往入京城下解圍。至衛南之北，逢見金人伏兵。接戰，金人佯敗，向東趨南華縣，澤追至南華，遇金人兩頭掩擊，官軍大敗。戰車大而難運，推駕之者苦之，一旦遇倉卒，皆委而走。澤變易衣服，隨敗兵隊，中夜奔走得脫。……金人取戰車，盡載軍實而去。<sup>39</sup>

宗澤的部隊推著戰車發動攻擊，但車輛太過笨重，以致部隊行進速度緩慢，使金兵很容易設下埋伏。當宋軍遭遇夾擊，士兵缺乏作戰意志，即捨棄戰車而潰走。使用戰車並未發揮預期中提供士兵防護，使其留

38 《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 145，〈欽宗皇帝·金兵下〉，頁 10。

39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許涵度刻本影印)，卷 85，〈靖康中帙〉，靖康二年三月，頁 7-8。

在戰場上抗敵的功能。

即使有失敗的前例，李綱在建炎元年的提議仍得到高宗的認可，除了下令製造戰車之外，也開始徵集可以教導士兵操作戰車的軍官。<sup>40</sup>宗澤也未放棄使用戰車，在擔任東京留守時，製造「決勝戰車」一千兩百輛，他在建炎元年十月寫給高宗的奏書中說：

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sup>41</sup>

仍然是以人力而非獸力來推動車輛，一車配備五十五人，其中十一人負責戰車的行動。宗澤強調開封城內的駐軍已經過適當的訓練，熟悉戰車的使用。但是，由於南宋政府內部和戰之爭與人事傾軋相當激烈，李綱為相只有七十八日，即於建炎元年八月遭到撤換。<sup>42</sup>宗澤也因高宗一再拒絕他的主張，於建炎二年(1128)八月憂憤而死，所訓練的部隊紛紛散去。<sup>43</sup>二人的車戰規畫，如同之前的諸多類似意見，皆未經實戰的驗證，而流於空言。

靖康、建炎年間是戰車最常被討論、製造和使用的時期。高宗在位的初期，對於戰車的提議仍感興趣。李綱、宗澤製造戰車雖無結果，高宗仍在紹興二年(1132)接受王大智的提議，下令依其進呈的樣式製造戰車。<sup>44</sup>次年，戰車製造完成，卻無法在作戰中使用，促使高宗公開

40 李綱，《李忠定公奏議》，卷7，〈乞催教車戰使臣教頭筭子〉，頁11。

41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0，「建炎元年十月庚申」條，頁261。

42 陶晉生，《宋代外交史》（新北：聯經出版社，2020），頁252。

43 《宋史》，卷360，〈宗澤傳〉，頁11284-11285。

44 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

宣誓戰車並非適合戰鬥的器械：

壬申，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始，大智以獻戰車式得官，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上因諭輔臣，以車非利器。席益曰：「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sup>45</sup>

按照席益的說法，車戰只有在交戰雙方皆使用車輛時進行。當對手為步兵時，戰車已難以對抗，至於使用戰車對抗騎兵，更是必敗無疑。也就是說，戰車只能在古代使用，依照宋軍所面對的現實狀況，已不可能再採行車戰，這與徽宗時李復的看法十分接近。紹興三年(1133)已是高宗即位的第六年，其間一再被提出的戰車構想，至此才被正式否決。在此之前曾多次進行戰車的製造，顯然只是造成軍事投資的浪費。

儘管南宋高宗已明確對宰執表達戰車不堪使用，等到紹興三十年(1160)宋金關係趨於緊張之際，又有人倡議車戰，高宗再度加以反駁：

上諭宰執曰：「近有獻用車戰者，朕以用在人、不在車。南北異宜，木性亦異，如大舟以荔枝木為棹，北方絕無；而造車多用榆木，南方亦少。況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何所用？卿更宜精思。」湯思退曰：「謹遵聖訓。」<sup>46</sup>

高宗生長於汴京，即位之後移居江南，對於南、北地理與氣候的差異有清楚的體認。江南既缺少製作車輛的榆木，水道縱橫的地形也不利騎兵與車輛的行動。但是，即使高宗在位時一再表示戰車無法用於作戰，仍無法阻止後續的車戰倡議。

高宗認為戰車在水道縱橫的南方不易使用，自是符合現實狀況

甲集卷 18，〈舟師〉，頁 435。

<sup>45</sup>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67，「紹興三年七月壬申」條，頁 1309-1310。

<sup>46</sup>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85，「紹興三十年八月丙辰」條，頁 3593。

的觀察。但對心懷故國的士人而言，戰車也許不適合在長江流域使用，但宋軍當發動北伐，進入中原平坦的地勢，戰車就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因而主張不可停止對戰車的討論。楊冠卿(1139-?)在倡議訓練車戰的文章中說：

夫所謂教車戰者何也？……車戰之法行於古，著其效；求之今，未見其功。世之議者皆曰：「南人長於舟，非車之便也。」又曰：「江淮之阻，車不得方軌，車非東南之長技也。」嗚呼！使吾而果安於一隅也，則車戰之說誠如或者之議。吾欲長驅中原，洗清關隴，則車戰之法，誠非一旦卒然之計，寧不預講素練，以為必勝之策乎！<sup>47</sup>

即使承認當時並未出現成功使用戰車的案例，也同意江淮地區不適合車輛的移動，楊冠卿仍主張訓練軍人熟習車戰之法。在他看來，南宋不應苟安於江南，一旦宋軍北上，就必須使用戰車，可見他視戰車為在平坦地區對抗騎兵的必要裝備，倡議戰車與恢復故土的訴求有直接的關連。

另一方面，宋軍在野戰時面對騎兵，長期居於劣勢，則是促使戰車提議歷久不衰的現實因素。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宋軍在陸戰上難以抵抗，只能在金兵企圖渡長江時以水戰取勝。<sup>48</sup>孝宗隆興元年(1163)，張浚(1097-1164)指揮宋軍發動北伐。宋軍的攻勢一開始進展順利，但在佔領宿州之後，金方調集主力發動反攻，雙方在宿州城外進行大規模的野戰，金方對於戰鬥的過程有較為詳細的描

47 楊冠卿，《客亭類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9，〈教車戰說〉，頁8-9。

48 參見陶晉生的專書《金海陵帝的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3)。



述：

[李]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為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蒲查擊敗之。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為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sup>49</sup>

李世輔即李顯忠(1109-1177)，出身陝西武官世家，精於騎射，後於高宗紹興九年(1139)南下投宋。<sup>50</sup>他指揮步、騎兵出城野戰，步兵以盾牌和「行馬」作為遏阻騎兵的工具。金兵被迫下馬作戰，先拆除「行馬」，再以短兵器與宋軍接戰，但仍擊敗宋軍，迫使其撤退。

宿州之戰進行時，李椿(1111-1183)正在張浚的幕下，他很可能是有鑑於宋軍以步騎兵無法擊退金人，而向孝宗提議使用戰車：

虜所恃者眾與騎耳，我若必以騎圖勝，萬無是理，當思有以制其騎，斯可矣。……臣嘗見諸所以禦虜騎者多用拒馬，二人共舉，其一手不能別執兵器。所以拒敵，比車之為用，不相侔矣。臣又見兵官陳敏造車數樣，皆不適用，……而宋武用車四千乘，以布為幕，下山東，滅慕容超；又用大槌發短矛於車上，以數千人破元魏數萬騎於河北。馬隆用偏箱車，以數千人救西州，虜不能近。以是言之，車之為用可以禦馬，明矣。臣謂宜委曉事兵將官討論戰車之製，試閱以為制馬之具，則軍勢必振。<sup>51</sup>

<sup>49</sup> 脫脫等編，《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87，〈紇石烈志寧傳〉，頁 1932。

<sup>50</sup> 李顯忠的生平，參見《宋史》卷 367〈李顯忠傳〉，頁 11427-11433。

<sup>51</sup> 李椿上奏孝宗的時間並沒有明確的記錄，奏書全文收錄於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據永樂十四年[1416]內府刊本影印)，卷 336，〈禦邊〉，頁 30。朱熹為李椿撰寫墓誌銘，提及：「張忠獻公節制兩淮軍馬，辟準備差遣，及拜宣撫都督，皆以自隨。……」

李椿認為當時宋軍的騎兵無法與敵軍匹敵，使用「拒馬」抗騎的效果也不佳，必須使用戰車。他雖然承認高宗時期陳敏所造的戰車並不實用，卻以宋武帝劉裕(363-422，420-422在位)以戰車擊敗北魏的騎兵，晉代馬隆也曾成功使用偏箱車作戰為例，堅持戰車可以對抗騎兵。這種主張全然忽略古今時空的差異，儼然是將歷史上任何使用車戰的前例，作為支持宋軍使用戰車的理由。事實上，李椿對於宋軍要如何使用戰車毫無概念，而是建議孝宗委任熟知作戰事務的武官討論以車作為剋制敵騎的具體方式。由此看來，李椿之所以倡議車戰，既源於宋軍受制於敵騎的事實，也由於他對歷史知識的實用性具有高度信心，相信只要在歷史上出現過的成功案例，即可於現世複製。相較於前述李復、席益等人強調古今戰法有異，歷史上的前例難以套用，李椿對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看法顯然不同。因此，南、北宋之交，官員對於車戰的不同立場，也代表他們對於歷史知識的實用性，存有相異的立張。

## 六、南宋後期的發展

在隆興元年北伐失敗之後，南宋軍隊主動向北方出擊的機會相當有限。寧宗(1168-1224，1194-1224在位)開禧元年(1205)與理宗(1205-1264，1224-1264在位)端平元年(1234)，宋軍曾兩度北進，都很快遭遇挫敗而撤退。<sup>52</sup>因此，在南宋後半期，宋軍鮮少與敵軍騎兵進行大規模野戰。

---

公為奔走兩路，綏集流民，布置屯兵，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寨險要，凡四五反，詳審精密，所助為多。它如謂『督府當鎮無為，請制戰車以易拒馬』之屬，未及行者尚眾。」可見李椿建議造戰車應在張浚幕府時期或稍晚，參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卷94，〈數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頁4546。

<sup>52</sup> 關於開禧(1205-1207)、端平(1234-1236)年間宋軍北伐的過程，參見粟品孝，《南宋軍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192-198、213-216。

在交通要地構築城堡防禦，在敵軍入侵時堅壁清野，配合水軍阻止敵軍渡江，成為主要的作戰方式。<sup>53</sup>由於野戰的比重下降，且東南地區的地形複雜也不便於戰車的使用，中央政府乃不再重視戰車的製作。<sup>54</sup>任職邊區的將領、地方官製造或使用戰車的案例，只見諸私人的記載，相關資料零散而模糊，無法得知詳情，也難以考證此類紀錄的真實性。例如：武舉出身的厲仲方(1159-1212)擔任和州知州時曾造戰車，後由繼任其位的周虎(1161-1229)於開禧三年(1207)加以使用，在清水鎮擊敗金兵，此事見於葉適(1150-1223)為厲仲方所撰寫的墓誌銘。<sup>55</sup>後來李心傳收錄其事於《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但特別註明「不知其詳何如也。」<sup>56</sup>至於周虎的傳記資料，雖皆強調他防衛和州之功，卻未曾提及使用戰車之事。<sup>57</sup>類似的孤證又見於陸游(1125-1210)在嘉定元年(1208)二月，為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的田琳所撰寫的「生祠記」。陸游記載田琳在開禧三年成功抵禦金兵對廬州的攻勢後，「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虜屯兵。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為之，果取勝。策勳真拜達州刺史，且以車制頒之諸軍。」<sup>58</sup>宣稱田琳利用自

<sup>53</sup> 參見方震華，〈晚宋邊防研究(A.D. 1234-127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11。

<sup>54</sup> 《宋史》的編者在概述南宋的軍備時說：「渡江後，東南地多沮洳險隘，不以車為主。宗澤、李綱有戰車法，王大智獻車式，皆不復用，而屬意甲冑、弧矢之利矣。」見《宋史》，卷197，〈兵志十一〉，頁4922。

<sup>55</sup> 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水心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22，〈厲領衛墓誌銘〉，頁422。

<sup>56</sup>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8，〈舟師〉，頁436。

<sup>57</sup> 周虎的傳記參見孫應時，《重修琴川志》(臺北：大化書局，1980，宋元地方志叢書本)，卷8，〈人物〉，頁27-29；劉宰，《漫塘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72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卷32，〈故馬帥周防禦壙誌〉，頁19-23。

<sup>58</sup> 陸游，《渭南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47冊，北京：線裝書局，

已設計製造的戰車，擊敗在濠州駐守的金兵，朝廷因而將戰車形制頒給各軍。但是，在陸游的記載之外，並沒有何資料顯示宋軍在嘉定年間開始普遍製造和配置戰車。在寧宗朝以後，目前可見的，僅有理宗淳祐四年「孟珙造戰車」的記載。<sup>59</sup>因此，即便這些零星的紀錄全數屬實，只能代表戰車曾在個別戰役中被使用，而未曾持續、普遍的用於作戰。但是，南宋士人仍熱衷於討論車戰，留下為數眾多的文獻，形成論述與實務脫節的現象。

將歷史書籍當作軍事知識主要來源，促成車戰論述在南宋後期更加流行。此一事實反映在對「墨兵」一詞的闡發和使用上。以「墨兵」作為「史籍」的別稱，代表將前代史事的記錄當成軍事知識的淵藪，現存南宋文獻皆稱此種理念始於晚唐的孫樵。<sup>60</sup>但是，不僅傳世的孫樵著作未見「墨兵」一詞，現存晚唐、五代與北宋的文獻亦未見相關的討論。由此可見，普遍使用「墨兵」一詞並闡述其內涵，是南宋才出現的現象。朱黼編著的《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在開禧三年刊行，吳奂然在此書的序言中說：

史籍謂之墨兵，墨兵者，政以兵權、將略、五間、六強，凡所以濟雷風之用，運時雨之神，皆可操之以為驗也。國朝司溫國公著《資治通鑑》，奎文榮冠，萬代之著也，而於三國、六朝與五間之世，其內修、外攘未嘗少略。豈不以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兵所以昭文德，則墨兵亦所不容略乎！……況當靈旗北

2004，據宋嘉定刻本影印），卷21，〈廬帥田侯生祠記〉，頁9。

<sup>59</sup> 佚名撰，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2，147。

<sup>60</sup> 參見朱勝非，《紺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3，頁19；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73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宋刻本影印），前集卷39，〈文籍類〉，頁14。

指，諸君封侯之秋，此書尤當汲汲於講貫之也。<sup>61</sup>

將史書內容視為各種用兵策略的彙集，讀者可從中學習「內修、外攘之法」，並強調正當宋軍發動北伐之際，讀書人將以軍功博取功業，自當注意史書中的各種軍事策略，而朱黼之書的撰寫即有此目的。

由於史書被視為軍事知識的重要來源，加上科考中的策論不時觸及軍事議題，幾部在南宋後期編成的類書，以及為舉子準備策論作答範例的參考書中，皆有專論「車戰」的條目。<sup>62</sup>相關內容皆是列舉歷史事例，強調以車抗騎的可行性或必要性，例如：

國初用於西北，制敵取勝，車戰為利。澶淵之戰，李德隆[當作李繼隆]以大車環壘，步騎處中，戎馬因是而遁去。陽城之勝，符彥師[當作符彥卿]以拒馬為行寨，虜騎因是而莫禦。行載兵甲，止為營陣，郭固之式，馬燧之舊制也。駕以牛車，上置槍刀，吳淑之法，衛青之故智也，此固國朝用車之明驗也。然亦不輕用也，若山徑之蹊，可用小車而不用大車，其察形熟矣。<sup>63</sup>

<sup>61</sup> 朱黼，《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80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據清鈔本影印)，吳奕然〈序〉，頁437。

<sup>62</sup> 參見林駟，《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元延祐四年圓沙書院刻本)，前集卷2，〈車戰〉，頁6-8；佚名，《群書會元截江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5，〈步騎附車戰〉，頁1-31；章如愚，《山堂考索》(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明正德劉洪慎獨齋本影印)，後集卷45，〈兵門·車戰類〉，頁1-5；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重印十通本)，卷158，〈兵考十·車戰〉，頁1375-1379。

<sup>63</sup> 林駟，《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2，〈車戰〉，頁7-8。幾乎相同的內容亦收錄於佚名，《群書會元截江網》，卷15，〈步騎附車戰〉，頁28-29。

仔細分析上文所提案例，可以發現明顯不合史實之處。所謂北宋初年曾以戰車在西北地區獲得勝利，在傳世文獻中並無任何實際事例可資證明。又說符彥卿(898-975)在陽城之役「以拒馬為行寨」，擊敗契丹。但陽城之役發生於後晉開運二年(945)，後晉軍是以騎兵乘風勢破敵，與戰車或拒馬無關。<sup>64</sup>以此戰役作為使用戰車的前例，可說是張冠李戴。至於吳淑與郭固的構想皆僅限於提議，未曾真正施行，以之與衛青、馬燧在戰場上使用車輛的史實相比擬也不恰當，書寫者很可能是為了強調戰車的功用而拼湊史實。

由於類書與科舉用書擁有廣大的讀者，使得以車抗騎的理念在南宋後半期傳播得更為普遍，而南宋對外政策的改變，也促使車戰之說更加受到重視。隨時金朝國勢在宋寧宗時代趨向衰弱，復仇主戰之說在南宋內部漸成主流。恢復中原的期望與使用戰車相連結，像是林駟就說：「今由南而北，直趨中原，欲禦突虜之勢，誠不可無車也。」<sup>65</sup>與南宋前期的楊冠卿類似，林駟也認為若要恢復中原，必須以戰車對抗騎兵。另一方面，復仇論的盛行導致當時人重新評價高宗朝和、戰爭議的歷史，在建炎年間(1127-1130)堅持主戰的官員受到歌頌，宗澤、李綱等人的形象與地位大幅提升。<sup>66</sup>前述宗澤在靖康二年使用戰車而戰敗之事，被認為是出於政敵的捏造而非可信之史實。例如：李心傳(1167-1244)在比對相關記錄後，指出關於宗澤大敗於南華縣的說法皆出於其政敵之手，斷言此事「恐未足信。」<sup>67</sup>如此

<sup>64</sup> 陽城之役的過程，參見《舊五代史》，卷 83，〈晉書·少帝紀〉，頁 1102-1104；《宋史》，卷 251，〈符彥卿傳〉，頁 8838。

<sup>65</sup> 林駟，《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 2，〈車戰〉，頁 8。

<sup>66</sup> 參見方震華，〈復仇大義與南宋後期對外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2(臺北，2017)，頁 322。

<sup>67</sup>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3，「建炎元年三月壬寅」條李心傳自注，頁 82-83。但若比對金朝方面所留下的文獻，可知宗澤兵敗南華縣

一來，宗澤企圖以戰車對抗騎兵，轉而被某些文官視為可以仿效的前例。例如：吳泳在上呈理宗(1205-1264，1224-1264在位)的奏書中說：

敵之長技惟在於馬，長淮邊面率多平曠，敵馬易於馳驟，中國所以制馬之具，亦豈無策。如宗澤軍以戰車當其衝，韓世忠軍以長斧斫其足，劉錡軍以竹筒盛熟豆亂其羣。近世畢再遇、扈再興之徒猶能募敢死軍，用麻扎刀以截其脛，或淤洳其田以為陂塘，或縱橫其畝以為溝洫，皆是制馬良策。宜及此時，專立一科，使獻策之士，各陳所見行，下諸帥司，精擇而用之。<sup>68</sup>

宗澤使用的戰車被認為足以抵擋騎兵的衝鋒襲擊，成為「制馬良策」之一。這顯示南宋後期士人檢視原本分歧的歷史紀錄，進行挑選淘汰後，有利於宗澤的紀錄被接受，以致原本失敗的案例反而成為可供參考的典範。

不過，南宋後半期的車戰論述並非僅限於歷史前例的引用與討論。為了解決戰車無法在崎嶇地形使用的問題，部分官員倡議以小型的「輕車」來取代北宋時期所使用的大型車輛，甚至研發可拆解和組裝的車輛；在遭遇無法通過的地形時，將車輛拆解，到達平坦地區後再重新組裝，以求兼具機動性與防禦性，相關論述中以華岳(?-1221)的說明最為詳細。華岳曾就讀武學，後來擔任軍職，於開禧三年上書寧宗，指出南宋的騎兵在數量與質量上都不足以與金人匹敵，唯一可制敵取勝的就是車：

然則何以制之邪？曰車而已。夫所謂車者，太公之扶胥，其制不傳於古；楚子之乘廣，其用不適於今。……昔信陽使臣張敵

應確有其事，參見確庵、耐庵編，崔文印箋證，《靖康稗史箋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前言〉，頁10-11。

<sup>68</sup> 吳泳，《鶴林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7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影印)，卷20，〈邊備劄子〉，頁14。

萬嘗爲車以獻於朝矣，下置四輪，上施一屋，前張以幔，後掩以木，其制非不善也。然十人兩牛，非獨力之所能舉。臣之爲車則不然，能總數木之器而聚以成車，則車之用可以禦敵騎之衝突；分一乘之車而析以成器，則器用可以助吾兵之搏擊。平原曠野則合而爲車也，勢如山嶽，環如營壁，而敵騎不得以嬰吾之鋒；阻山帶河則析而爲器也，長以禦短，短以禦長，而敵人不得以測吾之妙。古之車大而艱於搬運也，吾之車小而易於搬運。<sup>69</sup>

有鑑於之前張敵萬建議的戰車太過於笨重，華岳強調自己設計的車十分輕便，也可以拆解、組合，除了便於移動，拆解下來的零件可以在戰鬥時作為武器使用。到達平原後將車輛組裝、相連，可形成營壘，阻止敵騎的衝鋒。

華岳的說法可能代表了寧宗時期對於戰車的新概念，同一時期的劉宰(1167-1240)曾紀錄其友人范克信(1149-1217)對戰車的規畫，與華岳的構想頗為類似：

平居喜從老校、退卒語，因得古車戰遺法，益推廣之，爲《連弩輕車圖說》，上之朝。謂陸可馳，川可涉，險可析而踰。軍行可以束部伍，遇敵可以制衝突，其說雖宿將莫能奪。朝廷下其制江上諸軍，俾造車如其制。復命君董役廬、和間，會敵退止。而紳間率以此知君，薦者用爲口實。<sup>70</sup>

同樣是規畫可以拆解的輕型車輛，強調可行駛於平地，通過河流，遭遇險阻時則將車拆解後通過，士兵於車上使用連弩對敵人進行攻擊。劉宰強調此一構想雖未能施行，卻使得范克信得到其他官員的賞識，可

69 華岳，《翠微北征錄》(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78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貴池先哲遺書本影印)，卷1，〈平戎十策〉，頁8。

70 劉宰，《漫塘文集》，卷29，〈故廣西經略司幹官范承事墓誌銘〉，頁8-9。



見此一新穎的構想，在當時曾引發一些關注。華岳和范克信的例子說明，部分南宋後期倡議戰車者，確曾針對戰車在實際使用上的困難，尋求解決之道。只是他們二人始終未能脫離基層職位，得不到執政者的支持，以致相關意見未能付諸實踐，也就無法驗證這些創新構想的可行性。<sup>71</sup>

## 七、結論

宋代的車戰起源於應付遼軍持續攻擊平坦的河北地區，為了阻擋騎兵的衝鋒，而有將車輛相連，結成方陣進行防禦的主張。倡議者援引前代的史書與兵書，強調車戰的可行性。但是，在宋代之前，使用車輛作戰，存在「馳車擊戰」與「以車為衛」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前者是以戰車進行衝鋒攻擊，必須使用輕便而體積較小的車輛；後者則將車輛相連作為防衛工事，勢必使用「大車」。在宋人的論述中，有時區別這兩者的差異，強調車戰的「古今之別」；有時又將兩者混為一談，作為戰車可用的例證。結果是車戰的倡議紛陳，卻始終難以釐清戰車的具體形制、作戰功能與操作之法。因此，宋代倡議戰車者雖一再強調車戰的功效，相關論述實存有根本性的缺陷。

就實務而言，「戰車」根本不存在於宋代軍隊之中，「車戰」看似是宋代官員「復古」的主張，實際上卻是倡議者根據文獻記載進行作戰上的「創新」。各種車戰的規畫不僅需要軍中將士的接受與配合，其成效更有待實戰的驗證。從北宋初年即陸續提出的車戰構想，直到徽宗朝才真正有「戰車」被製成。只是崇寧三年製造的車輛太過龐大，無法用於作戰。直到北宋末年，宋軍才在實戰中以戰車對抗金人的騎

<sup>71</sup> 華岳的生平見《宋史》，卷 455，〈忠義·華岳傳〉，頁 13375-13378；范克信的生平見劉宰，《漫塘文集》，卷 29，〈故廣西經略司幹官范承事墓誌銘〉，頁 6-10。

兵，但未能發揮預期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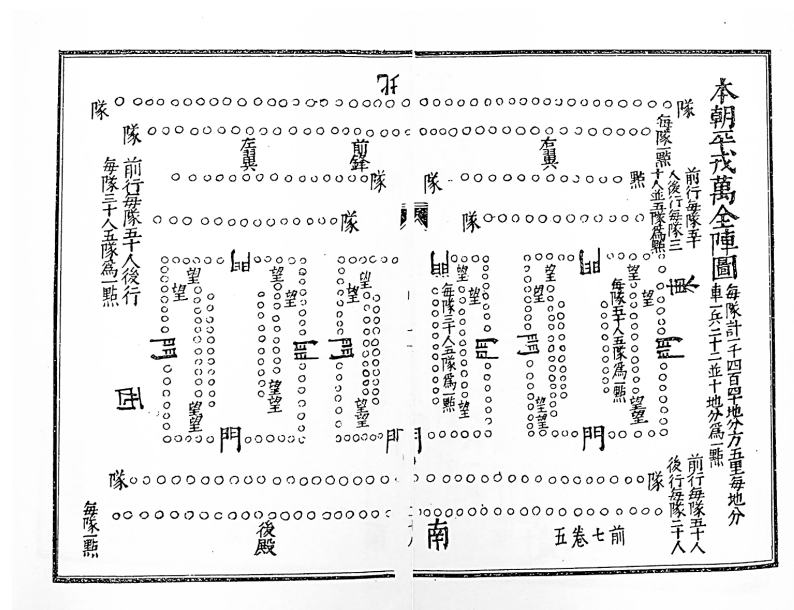
從北宋到南宋，即使已有幾次失敗的前例，車戰的構想仍一再被提出，顯示宋軍難以對抗騎兵的困境始終存在。在騎兵的攻擊下，宋軍往往快速的潰散；如何提供有效防禦，使士兵有信心留在戰場上持續作戰，成為首要的考量，戰車一再被賦予此種功能。缺乏實戰經驗的文士，由於只能憑藉書本知識來構思作戰，不免認定歷史的前例皆可仿效；加上身處於被動防禦的大環境中，習於從防衛的角度倡議使用戰車。南宋文士對強兵復仇的熱切期盼，產生出大量討論車戰的論述，但在現實層面中，戰車的製造只是浪費資源，無法產生正面的助益。

宋代讀書人主要從史書與兵書中獲取軍事知識，但兩者所傳遞的知識性質有明顯的差異。宋代以前的兵書往往託名古代的聖王、名臣，具體的寫作時間不明，無法判斷其內容所代表的時空環境，但後世的讀者往往視之為可適用於各個時代的權威理論。相對的，史書所載的內容則有特定時空，呈現出古今的差異。宋代讀書人對戰車的不同立場，似乎也反映了此種知識性質的歧異。持反對立場者多強調古今之別，質疑模仿前代作法的可行性；而倡議車戰者則認為歷史上成功的事例皆可施用於今日，以致提出的構想往往與現實有所落差。到了南宋中後期，士人、官員對戰車的討論終究無法突破現實上的限制，最終只能演變成一種學術性或理論性的探討，與實際的作戰沒有太多的關連。

(本文於 2021 年 8 月 25 日收稿；2022 年 10 月 9 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宋代兵學與軍事政策」(計畫編號 NSC 106-2410-H-002-141-MY3)之成果，出版過程中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正意見，特此致謝。

附圖 1 本朝平戎萬全陣圖



資料來源：錄自《武經總要》，前集卷7，〈本朝平戎萬全陣圖〉，頁5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73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宋刻本影印。
- 佚名，《群書會元截江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3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佚名撰，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朝政要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
- 朱勝非，《紺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 朱黼，《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80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據清鈔本影印。
- 吳泳，《鶴林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7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影印。
- 呂望，《六韜》，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中國兵書集成影印中華學藝術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
- 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
- 李昉編纂，夏劍欽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點校二版。
- 李復，《潯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李綱，《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收入《閩刻珍本叢刊》，第 23 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據明正德十一年(1516)胡文靜蕭洋刻本影印。
-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收入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影印。

-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
-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林駟，《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元延祐四年圓沙書院刻本。
- 邵博著，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2。
- 胡宿，《文恭集》，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第 116 冊，臺北：藝文出版社，1969，據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影印。
- 范曄撰，司馬彪補志，《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孫應時，《重修琴川志》，臺北：大化書局，1980，宋元地方志叢書本。
-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國立北平圖書館印行本影印。
-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許涵度刻本影印。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重印十通本。
- 章如愚，《山堂考索》，北京：中華書局，1992，據明正德劉洪慎獨齋本影印。
-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陳均編，許沛藻等點校，《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2006。
- 陸游，《渭南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47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宋嘉定刻本影印。
- 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中國兵書集成影印明萬曆金陵書林唐富春刻本。
- 華岳，《翠微北征錄》，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78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貴池先哲遺書本影印。
- 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據永樂十四年(1416)內府刊本影印。
- 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
- 楊冠卿，《客亭類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水心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劉宰，《漫塘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72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點校本。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收入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影印。

確庵、耐庵編，崔文印箋證，《靖康稗史箋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

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二、近人論著

方震華，〈晚宋邊防研究(A.D. 1234-127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方震華，〈復仇大義與南宋後期對外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2(臺北，2017)，頁309-345。

何兆泉，〈宋代「以車制騎」問題初探〉，《軍事歷史研究》，2008：4(北京，2008)，頁115-121。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形成》，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23(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75-84。

楊泓，〈戰車與車戰——中國古代軍事裝備札記之一〉，《文物》，1977：5(北京，1977)，頁82-90。

楊泓，〈戰車與車戰二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3(北京，2000)，頁36-52。

陶晉生，《金海陵帝的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3。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

陶晉生，《宋代外交史》，新北：聯經出版社，2020。

粟品孝，《南宋軍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Defending the Cavalry by Chariots: The Concepts and Practice of Chariots in Song China**

Cheng-Hua F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en fighting with their Khitan rivals, the Song infantry often suffered from quick and overwhelming attacks by cavalry, so the Song ruling elites were eager to find a solution to protect their soldier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some famous pre-Song generals who employed chariots as defensive facilitie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ong emperors and officials. Some advocated constructing fortifications in the battlefield by connecting thousands of chariots, but this idea was hard to execute because their soldiers had not operated chariots in battle for hundreds of years. If the Song troops were to use chariots, both the type of chariots and the method of operation would have to be designed.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Southern Song, many officials submitted proposals for producing chariots to the court, and their efforts represented the attempt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s learned from books into the battlefield. However, their proposals usually lacked feasibility because chariot movement was too slow to compete with cavalry. When in battle against cavalry, Song soldiers lacked the time to build a defensive line by connecting their chariots, so the use of chariots never generated positive results. The fact that Song officials continually advocated defending against cavalry by using chariots only reflects their lack of tactical ability to defeat the rival cavalry.

**Keywords:** chariot, cavalry, military studies,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knowledge